

談火生

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

「現代性」概念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可謂是中國學術界的寵兒，對「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和西方「現代性」理論的譯介成為近年來學界常盛不衰的主題，不同學科、不同學派的學者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捲入這場討論。當他們各自借助不同的理論資源來界定「現代性」，特別是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時，遠在異域的劉禾積數年功力，在這片喧鬧的理論叢林中開闢出一塊林中空地：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

但此處所謂的「翻譯」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翻譯，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一書中明言：「我對跨語際實踐的研究重心並不是技術意義上的翻譯，而是翻譯的歷史條件，以及由不同語言間最初的接觸而引發的話語實踐。總體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詞語、新意思和新話語興起、代謝，並在本國語言中獲得合法性的過程」。劉禾對翻譯的關注及其重心的轉移來源於其獨特的問題意識及其對不同理論資源的反思，可以說，跨語際實踐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其獨特問題意識的引導下，通過與不同理論資源的對話而建立起來的。

作為一名從小生活在大陸，直到文革以後才留洋求學的中國人，劉禾被現代漢語形成過程中發生的一切所深深吸引。然而，現代漢語的形成不僅是對古代漢語的借用與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在與英語、現代日語及其他外國語言的衝撞與挪用過程中誕生的，我們今天所用的現代漢語無論在語彙還是在表述模式上，都與這些外國語言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聯。不僅是文學，思想、歷史同樣如此，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人們才建立起了關於傳統與現代、世界與中國、西方與東方等種種想像，並由此開啟了我們的現代性的大門。離開了翻譯，我們很難清晰地觀察近代中國興起的種種話語，以及這些話語是在一種甚麼樣的特定歷史場景中相互遭遇，更難以說明不同的話語類型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為甚麼某種類型的話語能得以勝出，並最終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中，劉禾發現了翻譯的重要性。

然而，我們的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卻並不將翻譯視為一個獨立的歷史事件。傳統語言學中的翻譯理論由於學科的限制，僅局限於技術意義上的精益求精，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即便是頗具啟發性的後殖民理論家在面對這一問題時，雖注意到話語和理論在從歐洲向其他世界旅行的過程中，被創造性地借用、挪用的事實，但由於他們賦予理論以來去自由的主體性，而忽略了作為理論旅行所必須依賴的交通工具——翻譯。同時，由薩伊德（Edward W. Said）首倡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說，還暗含著一種東西方之間主從關係的預設，即西方作為主動的理論輸出方，而非西方則作為被動的理論輸入方。因而，他們基於印度等典型殖民地經驗建立起來的後殖民理論範式，無法很好地回應中國近代以來的具體歷史場

景，而常常陷入了西方統治與本土抵抗的老套。

正是在反思這些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劉禾挑起「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這樣一個極富啟發性的話題，為我們構造了一個新的觀察近代中國的視角。不僅如此，她還進一步追溯了造成人們忽視翻譯的認識論根源，她指出，導致我們忽視翻譯在中國現代性生成中的作用的認識論根源主要有二：一是語言的反映論幻象，二是語言的透明性幻象。前者認為語言只是反映社會現實，而否認語言建構現實的主體性作用。但福柯（Michel Foucault）告訴我們，知識與權力是密不可分的，知識不僅反映著權力的部署，它本身就是權力部署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後者以為概念、範疇、理論等思想的東西可以原封不動地以本來面目平滑地進入另一種語言和文化；或另一種文化原本就有與之相對應的語詞和意義，翻譯不過是起了一個中介作用，把對應的意義找出來而已。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翻譯並不是「某一絕對純粹的、透明和明確的可譯性的視野內」語言之間意義轉換的問題。原文和譯文相互補充，可以創造出比單純的翻版或複製更為豐富的意義。劉禾則進一步指出，語言之間透明地互譯是不可能的，不同語言的詞語之間想像性的對應關係並不是自明的，而是歷史地、人為地建構起來的。

由此，問題就進一步轉換為：不同語言的詞語之間想像性的對應關係究竟是如何從無到有地生產出來的？「文化」何以等同於culture？「個人主義」何以等同於individualism？「國民性」何以等同於national character？這些想像性的對等關係究竟是在歷史上的哪一個特定時刻、以甚麼方式建立起來的？不同語言的兩個詞語之間的多種想像性關係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為甚麼這一種取得了優勢地位，而另一種卻衰落了？隨著問題的轉換，關注的重心也隨之發生偏轉，在跨語際研究中值得予以首要關注的，是話語實踐與權力的各種形式。翻譯不再是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鬥爭的行為，它恰恰成為這種鬥爭的場所。新詞語和新意義的出現，不僅會在話語領域引起衝突和波瀾，而且會經過種種中介進入社會實踐，甚而成為社會變動的思想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不同語言的詞語之間想像性對應關係的跨語際研究，不能被等同於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關鍵詞（keyword）研究。一方面，關鍵詞研究仍然建立在反映論的認識論基礎之上，另一方面，關鍵詞研究雖然在研究中引入了歷史的維度，關注詞語、概念以及話語含義的變化，但卻無視這些含義在具體歷史場景中的用法，更不用說其所依存的表述框架以及語言與權力之間的複雜勾連。

为了更好地展開跨語際研究，劉禾構造了自己的術語，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與「客方語言」（guest language）來代替當下西方翻譯理論或後殖民理論中流行的「本源語」（source language）和「譯體語」（target language）這一對分析概念。因為「本源語」和「譯體語」的二分在跨語際研究中不僅不合適，而且會有誤導作用，它往往依賴於本真性、本原、影響等諸如此類的概念，其基本預設是：譯體語只有與本源語保持一致，才能獲得自身的合法性。這種理念一旦落實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往往要麼變成了強調原本本意的權威性，而落入西方中心的窠臼，使非西方國家陷入「失語」的境地；要麼像後殖民理論一樣，將非西方文化的能動作用簡化為一種單一的可能性：抵抗，從而落入「東方」、「西方」的二元框架而不自覺。這樣的研究路徑會從兩個方面遮蔽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一方面，它以本源語為標準，忽視了輸入方的翻譯者從中選擇、組合乃至重新發明新詞語、新意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遮蔽了輸入方在翻譯過程中被輸出方改變，亦或侵犯乃至篡奪輸出方之權威的可能性。

「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這一對概念的提出正是為了敞開這種種的可能性。在新的分析框架的觀照之下，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互動，總是由主方語言的翻譯者或其他實踐者從客

方語言中邀請、選擇、組合乃至重新發明各種詞語和文本而開始的，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生了「改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由此，劉禾賦予了主方語言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並通過翻譯在主方語言和客方語言之間的中間地帶，開闢出一個新的歷史空間，非傳統的並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所謂現代的也並不必然是非中國的，從而跳出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二元陷阱，消解對於現代性的本質主義理解。在這種理論關懷下，嚴復的《天演論》就不會簡單地被視為對原著的歪曲，而會被視為一種極富創造性的努力。

跨語際的實踐就是要考察新的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模式，如何通過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與衝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並獲得合法性。這樣的考察要求我們將注意力從現代歷史的連續性或過渡這樣一些抽象的問題，轉移到各個民族以及不同的人群之間每一對抗的關頭所存在的各種事件的偶然性、鬥爭以及意外的扭曲和轉折；關注那些歷史偶然性的關鍵時刻，西方和中國過去的思想資源究竟是怎樣被引用、翻譯、挪用和佔有，從而使被稱為變化的事物得以產生。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劉禾的工作已經盡善盡美了，事實上，已有人指出其後殖民主義的視角導致她在某些具體材料上的誤讀，我在閱讀過程中也發現其在具體論述過程中對於一些重要材料的遺漏，如她在第三章「個人主義話語」中特別提到：「我覺得他（指高一涵）論點中很特別的一點倒不是『人民』這個概念，而是他對個人individual一詞的譯法『小己』」，實際上，早在數年前，嚴復翻譯《群學肄言》和《群己權界論》時就已經用「小己」來翻譯individual，但「小己」與individual之間的想像性對等關係即使在嚴復那裡也沒有固定下來，因為嚴復本人還曾用「小己私行」來譯private life，有時也用「民」來翻譯individual。然而，到了五四，「小己」與individual之間的想像性對等關係開始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穩定性，而且被置於「小己／大己」這樣的語言機制之中。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正是跨語際研究所關心的問題，但劉禾對此似乎有些失察。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此，在我看來，關鍵還在於如何進一步將其他理論資源整合到跨語際實踐的框架中，並在操作過程中將其落到實處。其實，《跨語際實踐》的後三章已經在這麼做了，在其中我們就不難發現福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影子，但也僅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而已，離劉禾給自己設定的目標——考察新的詞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中被創造出來以及其在主方語言的權力結構中傳播、操縱、部署並最終獲得統治地位的過程——似乎還有一段距離。不過，學術本來也不是一人一時就能鑄就完美的，劉禾自己不就聲明，希望跨語際實踐的概念可以最終引生出一套詞彙，協助我們思考嗎？